

# 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

文 雅

**【摘要】**波德莱尔被公认为西方现代派诗歌先驱、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派思潮的领军人物。自1919年波德莱尔进入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中国学界对其作品的译介和诗学理论的研究就不曾间断。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引进、政治敏感时期的冷落与批判、20世纪70年代的缓慢回升以及80年代以后的迅猛发展,进入新世纪的波氏研究在稳步前进中不时出现可圈可点的作品。

**【关键词】**波德莱尔;译介现状;接受走势

**【作者简介】**文雅(1980-),女,四川遂宁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意大利语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与比较诗学,E-mail:wanya@sisu.edu.cn(重庆 400031)。

**【原文出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洛阳),2018.4.144~150,158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2016年科研项目“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sisu201611);重庆市2017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17SKG113)。

## 0. 引言

“波德莱尔处于荣耀的顶峰;……因为有了波德莱尔,法国诗歌终于冲破了国界,在全世界被阅读。它的诗歌被认为是真正的诗歌,是现代性本身;它的诗歌让无数人模仿,也滋养了无数的头脑。”(Pichois 1975: 598)波德莱尔的诗歌,不仅滋养着后来法国现代派的文学大师们,也从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探索两方面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从早期的鲁迅、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王独清、冯乃超、穆木天,到稍后的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再到冯至、艾青、穆旦,都曾直接或间接地从波德莱尔的诗歌中吸收过营养,创作出具有象征派诗歌特征的作品。

## 1. 波德莱尔研究状况分析

中国对波德莱尔的接受,经历了一个较为坎坷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初期,刚刚被引入中国的波德莱尔以他与众不同的美学观,吸引了大批文人,受到了热情洋溢的译介。进入40年代,战后的中国文人在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对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提出了质疑,对是否应该译介他的诗歌产生了怀疑,虽然波德莱尔的作品有了新译本,在工具书系列图书中也对波德莱尔做了定位和介绍,但总的来说,译介工作进行得比较迟缓。六七十年代,译介与研究

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文学艺术的创作、诠释和批评渐渐获得了充分的自主空间,以波德莱尔为主题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翻译热潮与研究浪潮交相辉映。这段时期,评论者们或者从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出发,或者从比较视角出发,或者引入外国的研究成果,交出了不少有见地、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本文对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研究情况的梳理,分两个时间段考察:第一个时间段为1919-1979,第二个时间段为1980-2016。理据如下:第一个阶段是波德莱尔接受的迂回发展期,从最初的狂热到后来的相对冷落,其间波氏研究呈现出缓慢进步的状态。1980年以后,波氏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期,研究成果从量变到质变,取得了可喜成绩。从资料搜集情况看,1980年以前的资料,只能通过图书馆人工查找,而1980年以后的资料,则可以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比较准确的量化分析。

### 1.1 1919-1979: 迂回发展期

波德莱尔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学者视野,是在1919年周作人发表于《新青年》的题为《小河》的白话诗里。在该诗的短序中,周作人谈及自己的诗歌形式与波德莱尔的散文诗略像,认为波德莱尔对散文

诗体有开创性的功绩。李璜 1921 年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法兰西诗之格律及其解放》，主要论述法兰西诗歌格律的解放过程，虽不是对波德莱尔的专题研究，但概括了法国诗人对美的特殊定义，以及对恶的非常见解，并称之为危险诗人(poète malsain)。国内第一篇全面介绍波德莱尔的文章是田汉于 1921 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该文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波德莱尔，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年同月，周作人发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纪念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德莱尔一百周年诞辰，周作人肯定他们的思想是“现代人的悲哀而真挚的思想的源泉”，认为波德莱尔是“颓废派”的鼻祖，并指出“颓废”一词所包含的现代意义，强调它是理解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重要切入点。1924 年，徐志摩翻译了《死尸》，发表于《语丝》周刊，诗前附有 1200 字的长序，高度赞扬了波德莱尔独特的美学观，称《死尸》是诗集中“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并暗中抨击某些对波德莱尔持异议的文人。有趣的是，鲁迅因看不惯徐志摩文中那种“自视超群又自怨自艾的才子做派”，在当月的《语丝》第 5 期上发表了《音乐》一文，对徐志摩的神秘音乐态度进行了嘲讽和批评。

总的说来，早期的中国文人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波德莱尔的精髓和特色，对其做出独到的评价，体现他们对诗人的理解和认同，这与他们自己的诗人身份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波德莱尔被引入中国学界的初期，几乎呈现出全盘肯定的面貌，中国读者被诗人独特犀利的诗风所吸引。然而，1937 年爆发的战争让这种兴旺势头猝然中断。抗战结束以后，对波德莱尔的译介工作开始复苏，但经历了残酷战争的人们却开始思考，翻译波德莱尔的作品是否具有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

1946—1947 年间，学者们在《文汇报》上围绕波德莱尔是否值得翻译展开了激烈的笔战。陈敬容翻译了波德莱尔的若干诗作，并于 1946 年 12 月 19 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波德莱尔与猫》，阐发自己对波德莱尔独特的诗歌美学的认同和赞赏。紧接着林焕平也在《文汇报》撰文反对陈敬容的观点，而李白凤、司

马无忌随即也分别发表文章《从波特莱尔谈开去》《从自作多情说开去》表明立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波德莱尔诗歌的价值观是否值得提倡、翻译波德莱尔是否适宜。反对的声音认为他的诗歌是“不健康而且有害的倾向”，会“诱导青年的思想走向颓废的路途上去”。这大概是波德莱尔在中国最受争议的时期。

从 1949 年到 70 年代，波德莱尔的译介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在 1957 年，《恶之花》出版一百周年，有两篇关于波德莱尔的重要译文值得我们关注：苏联学者列维克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和法国作家阿拉贡的《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恶之花〉百周年纪念》。这两篇译文呈现了国外研究视野下的波德莱尔评论，成为日后国内波德莱尔研究的重要资料。

## 1.2 1980—2016：繁荣发展期

20 世纪 70 年代末，西方现代思潮再次引起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波德莱尔的译介工作也得到迅猛发展。1979 年，刘自强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波德莱尔的相应说》，可以算作波氏研究的承上启下之作。之前的研究总体上着力于对波德莱尔的整体介绍，而这篇文章第一次集中关注他的诗学理论，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看，具有创新意义。

进入 80 年代以后，国内的学术期刊逐渐增多。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波德莱尔”为“主题”、以“1980—2016”为时间段，在“哲学与人文科学”的目录下搜索，共得到 973 条结果。经筛选，保留以波德莱尔为研究主体的篇目，得到有效结果 296 条，分类统计见下表：

### 1.2.1 波德莱尔的作品及诗歌理论

从统计结果看，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对波德莱尔诗歌理论的关注远远高于其作品。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波德莱尔的诗歌理论和现代的美学观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发了研究热潮。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研究者并未真正进入波德莱尔的作品世界，并未扎实地以文本为基础，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挖掘波德莱尔的诗学魅力。

表1. 波德莱尔研究统计

论文类别	论文分类统计数			合计	总数
波德莱尔的作品及诗歌理论	作品	《恶之花》	62	68	193
		其他	6		
	诗论	综论	31	125	
		现代性	22		
		应和论	16		
其他	56				
波德莱尔与中国	波德莱尔与中国作家	鲁迅	13	49	59
		戴望舒	7		
		李金发	7		
		其他作家	22		
	波德莱尔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		10		
波德莱尔与法国及外国作家	波德莱尔与法国作家		11	44	296
	波德莱尔与外国作家		33		

## 1.2.1.1 关于波德莱尔的作品研究

由上表可以看到,研究主要集中在《恶之花》这部代表作上。中国学者主要从以下展开对这部作品的研究:1)对该诗集风格及价值的整体介绍,2)对某首诗的研究、赏析,3)对《恶之花》的主题研究。

早在1984年,廖星桥就发表了《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法国现代派文学浅探之二》,该文比较准确地界定了《恶之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外值得关注的有郭宏安在80年代发表的3篇论文:《〈恶之花〉:在浪漫主义的夕照中》(1987)、《〈恶之花〉:穿越象征的森林》(1989)、《〈恶之花〉:按本来面目描绘罪恶》(1989),从创作技巧、艺术突破以及历史价值等方面,全面深入地对《恶之花》进行了探讨。

最早着力于诗歌文本解读和赏析的文章是杜青钢1988年发表的《〈恶之花〉赏析》。作者结合诗人的通感理论,解读了《秋歌》《异国芬芳》两首诗歌的音律特点及文本意义。除此之外,《腐尸》是久负盛名的一首诗作,最能反映诗人“从恶中发掘美”的诗歌理念,因而成为研究热点,有不少学者研究它的创新手法及其另类的美学意蕴。《致一位过路女子》以现代城市“邂逅”为题材,体现出来的现代城市空间体验与审美的现代性,引起了不少关注。

关于《恶之花》的主题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刘波对诗集中“巴黎图画”一章的结构研究。他先后发表3篇系列文章描述和分析了该章节中“白昼”与“黑

夜”两个系列的回旋特征,深入地阐释了该作品基于美学和伦理的谋篇布局。此外,研究者们也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和主题考察《恶之花》这部诗集的创新意义:意象、象征、伦理、宗教、诗集翻译等问题。

如上所述,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研究了《恶之花》,无论是它的文学价值、诗学意义,还是创作风格、写作手法都得到了较多关注。但鉴于这部作品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在主题方面,仍值得研究。同时也应注意到,波德莱尔的其他作品受到了冷遇。只有零星几篇探讨《巴黎的忧郁》及散文诗体的文章,发表在级别不高的刊物上,内容也给人泛泛而谈的感觉。而其他散文作品,如《人工天堂》《我心赤裸》《火箭》等并未受到关注,还值得投入研究。在法国,波德莱尔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Lemaitre 1965: 22),他撰写了许多重要的美学评论。早在1987年,郭宏安就翻译了其中大部分评论并结集出版,题为《波德莱尔的美学论文选》,这是非常重要而且优秀的译本,为我们了解波德莱尔的美学观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资料。然而并没有一篇文章对其进行研究讨论,令人遗憾。

## 1.2.1.2 关于波德莱尔诗歌理论的研究

数据显示,国内学者对波德莱尔的诗歌理论尤为关注。在诗论研究中,综论一栏列入的是对波德莱尔的艺术风格及成就进行整体介绍或综合论述的文章。1980年,程抱一《论波德莱尔》、李健吾《有关

波德莱尔等人的评价问题——与《辞海》编委会商榷》的发表拉开了波氏研究繁荣时期的序幕。程抱一那时就结合诗歌文本对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精髓进行了深刻论述。李健吾不满《辞海》中对波德莱尔十年不变的评价,指出了其局限和偏颇之处。这两篇文章较早地把握了波德莱尔诗歌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及批判意识,并为之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和坚决的辩护,对于后来的波氏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之后的三十多年,不断有论文以综述的方式,考察波德莱尔的诗歌创新、象征主义美学、美学思想、艺术表现力、独特性、美学观念、审美意识、美学理论<sup>①</sup>等。这类文章的普遍特点是:题目选择过大过广、评论大多空乏重复、发表刊物级别不高。但研究者能够自觉地选择波德莱尔为主题,并对其进行评述,也是可贵的尝试。

《应和》一诗被看作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概括,“应和论”不仅丰富了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更直接影响了他对文学艺术审美和伦理两方面的认识。在刘自强1979年撰文探讨“应和论”之后,这一诗歌理论受到了持续关注。其中研究最为深入、最具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的是刘波2004年先后发表的两篇文章:《〈应和〉与“应和论”——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基础》《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刘波指出波德莱尔以古老的应和观念为基础,构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美学思想体系,这也对20世纪初中国诗歌创作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现代性”一直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而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瞬间性、偶然性、新奇性都体现了现代审美。因此在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研究的文章中,我们也发现更多具有代表性的、质量较高的文章。这些文章见解独到、论述深入,从不同角度对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进行了解读。在关于波德莱尔诗论的“其他”一栏里,我们列入了从不同角度、主题、研究方法出发对诗人进行研究的各类文章。包括诗人的审丑思想、唯美思想、颓废思想、伦理道德、宗教情怀;诗人的时间美学、城市经验、神秘主义、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及爱情观;诗人散文诗体的贡献、诗歌的音乐性、诗歌中的矛盾修辞、诗歌中的幽默性;研究者从隐喻、艺术、接受、存在主义的视角对波氏美学

特征的考察。

其中有3篇文章探讨波氏与艺术的关系,表明了大家对波德莱尔更大的兴趣和更立体的关注。波德莱尔作为“艺术批评家”的身份也逐渐受到关注和还原。

从数量上看,这类文章占有较大比重,从质量上看,显示出参差不齐的特点。总体上看,这部分文章给人一种波氏研究欣欣向荣的印象,也展现了学者们思路的不断开拓,美学话语的不断丰富,在广度和深度上有力地推动了方兴未艾的波氏研究。

### 1.2.2 波德莱尔与中国

自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确立并得到发展以来,从比较的角度考察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从统计结果也可以看出,“波德莱尔与中国”的主题研究已然成为热点。最受关注的是波德莱尔与中国作家的比较,研究者从社会背景、诗歌理论、文本分析等角度展开分析和论述。

80年代,研究者就已开始关注波德莱尔对鲁迅的影响,以及两者气质的契合、异同。有文献显示,鲁迅在初期创作期间正在阅读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他还找来该散文集的日文版和德文版准备翻译,虽日后译事未成,但通过这个时期的阅读,鲁迅对波德莱尔的作品产生了极强的共鸣(周怡2002:67)。两位作家作品中的象征主义手法,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精神的抑郁和心灵的苦闷,让研究者们看到他们之间的话语共鸣。

90年代伊始,作为中国象征派诗人的第一人、“东方波德莱尔”李金发进入研究者的比较视野。虽然其作品晦涩、模仿痕迹较重,受到褒贬不一的评论,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金发已成为研究“波德莱尔在中国”这一主题无法回避的人物。殷俊(1996:108-117)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提炼出在波德莱尔影响下,李金发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病态的美、忧郁的美、朦胧的美”。向天渊(1995:59-62)则着力探讨了两位诗人作品中死亡题材的差异性,通过挖掘“意象的不同、描绘重点的不同、表达意义的不同”,得出结论:如果说两者都对善保持着美好的向往,李金发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对“恶”的反抗精神却远远不如波德莱尔深刻和彻底。

2000年以后,研究者的视野明显开拓,他们在更多的中国诗人身上看到与波德莱尔的可比性。这类研究文章大多能较好地照顾到文本对照,让人觉得言之有物,论述得力。有的研究稍显牵强,但这些新颖的选题和论述也为中国的波氏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然而,这类文章虽然数目较多,但发表在核心或影响较大的刊物上的却非常少。

列入“波德莱尔在中国的译介和影响”一栏的文章,主要从整体上考察波德莱尔对中国诗坛的影响。这类文章的作者大多能通过扎实的文献考据,用归纳和分析的方法考察波德莱尔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也为新诗未来的发展指出了可行的道路。

### 1.2.3 波德莱尔与法国及外国作家

2000年以后,此类文章在数量上的增长反映了研究者考察视野的开拓和学问趣味的丰富,将波德莱尔与不同的作家对比研究,让这位法国诗人的形象更加丰满新鲜。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法国作家包括福楼拜、雨果、萨特、乔治·桑、普鲁斯特、兰波、福柯,其他国别的作家有萨迪克赫达亚特(伊朗现代作家)、爱伦·坡、艾略特、本雅明、狄兰·托马斯、谷崎润一郎、康德、金斯伯格、海德格尔、莎士比亚、柏拉图、马克思等,另外还有几篇文章关注了波德莱尔在俄国文学的接受。

关于波德莱尔与外国作家的比较,一些文章角度虽然新颖,但研究还不够深入。但仍有文章以作者扎实的研究成果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不断开拓中国的波氏研究视野。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在不同时期,对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阐释和借鉴。尤其是在中国新时代文化转型期,这种过滤与接受体现了波德莱尔现代性的美学思想与中国接受者内在需求与期待视野的高度契合。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波氏研究仍然呈现出视野、方法、格局的局限性。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因此波氏研究在中国学界大有发展空间。

## 2. 波德莱尔译著及研究著作的出版情况

《恶之花》在2000年以前就有戴望舒、杜国清、王

了一、莫渝、钱春绮、郭宏安、苏凤哲、胡小跃、张秋红等人的翻译,这其中最受欢迎的应属钱春绮和郭宏安的诗集全译本。2000年以后新增了郑克鲁、程准、杨松河、文爱艺、刘楠祺、欧凡的版本。郑克鲁也选译了《恶之花》的部分诗歌,结集为《波德莱尔诗歌精选》于2000年出版,主要面对青少年读者。2001年,程准重译了《恶之花》。2003年由译文出版社发行的杨松河译本,该译本态度严谨,注重形式美,但如今我们注意到,该译本受到读者认可的程度还是不及钱、郭译本。尤其是郭宏安的译本,相继由不同出版社再版了十余次,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2007年,诗人文爱艺出版了《恶之花》的全新译本,这部译作独特之处是添加了赏析部分。虽然很简短,往往是一两句话,但常常十分精当地点明了该诗的主旨,可以看出译者对波德莱尔的诗作有着较深的理解。译著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符合中国现代的表达方式。但从翻译的角度看,如果我们与原文对照,可以看出译者更多的是照顾到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中文的表达习惯,有时也以诗人身份进行了一些创作。总的来说,文爱艺的译本基本能够反映原作精髓,并且符合大众阅读习惯,他的译本先后3次再版。

对波德莱尔散文的翻译,最早译出且版本较多的是《巴黎的忧郁》。继邢鹏举1930年首次由英译本译出之后,石民、胡品清、亚丁、怀宇、胡小跃、钱春绮等都重译过。2000年后新添了郭宏安、张晓玲、肖聿、李玉民的译本。其中亚丁的单行译本颇受欢迎,经历了3次重印和2次再版。1992年出版的怀宇译本《波德莱尔散文选》得到3次再版。此外,2000年,肖聿翻译的《我心赤裸——波德莱尔散文随笔集》,让波德莱尔唯一的小说《拉·芳法萝》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至此,波德莱尔的重要文学作品几乎都得到了翻译。2007年,张晓玲翻译了《私密日记》,虽然内容上收录并无新鲜之处,但该译本也不失为精确优美的上乘译作。

关于波德莱尔的文艺批评,郭宏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在2002年以《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的书名再版。2005年,毛燕燕、谢强翻译了《我看德拉克洛瓦》,这实际上也是波德莱尔批评文章的一部分。200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取了郭

宏安译本中的《现代生活的画家》单独成册出版,这是波德莱尔对同时代画家居伊的赞美之作。2009-2013年期间,上海译文出版社将郭宏安译本中的内容分拆、重组,多次出版。

如此频繁的再版,展现了波德莱尔作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同时也反映了波氏美学符合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波德莱尔极具现代眼光的批评文字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研究波德莱尔的著作,2000年以前仅3册: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本雅明·瓦尔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李道新《波德莱尔是怎样读书写作的》。本雅明的研究颇受关注,先后由不同出版社发行了4个不同的版本。

2000年以后,波德莱尔研究作品以翻译作品为主:贝尔纳-亨利·莱维《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萨特《波德莱尔》、克洛德·皮舒瓦《波德莱尔传》,《波德莱尔传》是目前国内最为重要的波氏研究参考资料。除此之外,另有几本有关波德莱尔的重要研究著作得到翻译:雷蒙《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帕斯卡尔·皮亚《波德莱尔》、罗丝玛丽·罗伊德《波德莱尔》。这几部研究专著的翻译,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波氏研究纵向发展的良好态势。

从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情况看,郭宏安1993年出版的《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波德莱尔与〈恶之花〉》是国内第一部全面介绍波德莱尔诗歌艺术的作品。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再版了这部作品,更名为《论〈恶之花〉》,其研究的前瞻性以及波德莱尔深刻精准的认识,即便在今天,仍是一部帮助广大读者走近波德莱尔的经典佳作。

2006年,郭宏安又出版了《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波氏研究文章仅占全书的一小部分内容。2013年,刘波、尹丽出版了《波德莱尔十论》,集合了作者多年来对波德莱尔美学的思考,提供了一条深度了解波德莱尔的路径。2016年刘波出版了《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该书是目前国内学者中规模最大的波德莱尔研究成果,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此外,袁兆文2014年出版了《〈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该书主要将《恶之花》置于历史坐标,探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焦虑,其深度和创新程度值得学界关注。

### 3. 结语

综上,在研究波德莱尔的论文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1)对波德莱尔作品的关注主要停留在《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对其他作品有所忽略;2)波德莱尔的批评家身份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关于他的美学的研究的论文数量和深度都远远不够;3)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现代性以及他的应和理论受到了较多关注,有一些高质量文章,但大多数探讨波德莱尔文艺观的论文显得有些随波逐流,泛泛而谈,并无太多具有新意和深度的观点和论述;4)波德莱尔与其他作家的比较成为热点,虽然展现出研究者视野的开拓,角度的新颖,但是其论述力度和深度还有待加强。在译文方面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波德莱尔的重要作品基本都被译为中文,不乏优秀的译本和版本。在波德莱尔的研究著作方面,大多数的研究作品都是翻译国外学者的专著,与波氏在世界文学史上和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仍然很不对称。

总之,波德莱尔受到了中国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受欢迎程度从《恶之花》的再版盛况可见一斑,但研究成果仍然期待国内学者丰富。

#### 注释:

①这些词语皆为出现在文章题目中的表达。

#### 参考文献:

- [1]刘波.波德莱尔:从城市经验到诗歌经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刘波,尹丽.波德莱尔十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3]向天渊.论波德莱尔与李金发诗歌中死亡主题的差异性[J].外国文学研究,1995,(4):59-62.
- [4]殷俊.《恶之花》的移植——试论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J].国外文学,1996,(1):108-117.
- [5]袁兆文.《恶之花》及其现代性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 [6]周怡.战士的苦闷与叛逆者的忧郁——《野草》与《巴黎的忧郁》比较[J].鲁迅研究月刊,2002,(12):67-73.
- [7]Lemaitre, H. *La Poésie depuis Baudelaire*[M]. Paris: Armand Colin, 1965.
- [8]Pichois, C. *Œuvres Complètes de Baudelaire*[M]. Paris: Gallimard, 1975.